

让历史学充满魅力

——冯尔康与阎崇年学术对谈共话史学

朱亦灵



冯尔康



阎崇年

近日,“南开史学百年大讲堂——让历史学充满魅力”在南开

大学八里台校区举行,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二位清史学界名宿——

冯尔康先生与阎崇年先生展开学术对谈,追述古今,传道解惑,堪

称学林之美谈。这次对谈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杜家骥教授、常建

华教授担任导言人,两位导言人表示,本次对谈高朋满座,正是历

史学魅力的体现。

历史学研究离不开探幽发微,其领域的扩大、内容的丰富、重

大的发现,都离不开观念的更新、视角的转换及长年的积累。冯、

阎二位先生潜心治学七十载,对此均卓有建树。导言人向二位先

生请教了九个问题,寓意二位先生事业长久、学术之路长青。

问答一

常建华教授提问:冯先生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倡导中国社会史研究,影响广泛。请冯先生谈谈开展社会史研究的意义,以及发展的方向。

冯尔康先生作答:社会史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悄然兴起,它的出现改变了历史学以阶级斗争史为主线状况,凸显了历史学的社会文化功能。这种转化符合社会进步的潮流,也使历史学从“史学危机”中走了出来,摆脱了“历史无用”的消极论调,从而步入新的繁荣时期。当下,社会史研究还需要进一步自我深化和突破,拓宽研究领域。南开史学目前已有诸如常建华教授的日常生活史、王利华教授的生态环境史、余新忠教授的医疗社会史、许檀教授的社会经济史、卞利教授的民间契约与诉讼史等研究,希望他们能继续坚持,取得更多成果。

问答二

常建华教授提问:满学在新时期史学研究中的地位十分突出,请阎先生谈谈对满学的治学体会。

阎崇年先生作答:首先我想先强调冯先生的学术贡献。应该说,冯先生在史学史上的贡献是作为新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开创者之一,当选为中国社会史学会的首任会长。曾经的一部二十四史是帝王将相的历史,不关注妇女等边缘群体。辛亥革命虽推翻帝制,但民国存续时间过短,在社会史领域尚未有太多积累。新中国成立后至1976年,史学研究重视“五朵金花”,社会史研究的发展亦受到限制。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,冯先生开始提倡重新开展社会史研究,成为这一学科的奠基者,这是他作出的重要贡献。

满学研究方面,中国过去有蒙古学和藏学,却没有满学,这种情况与满族的人口基数和悠久历史不相匹配。民国时期在“驱除鞑虏,恢复中华”的政治氛围下,满学还不能登堂入室。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,也一时无暇顾及满学研究。改革开放后,满学研究的需求在国内和国

际交流中出现,建立满学社会科学研究随之提上议程,我尽力推动,很快得到有关部门的支持,建立了配套的研究机构,出版《满学研究》七辑和若干会议论文集。目前,一支满学研究的队伍已基本建立起来。

问答三

常建华教授提问:冯先生在宗族史和谱牒学方面也卓有建树,请您谈谈在这些领域的研究体会。

冯尔康先生作答:我的宗族史研究起初是跟着政治形势,对旧社会的宗族活动多有批判,但后来也认识到原先的观点不合理,不能根据某种情况、形势的需要来进行判断和论述,研究历史一定要从实际出发,这是我研究宗族史的缘起。在过程中,我比较注重通史的研究,这也是南开史学的传统。但因学识、精力有限,我主要集中关注近当代宗亲会的研究,由此注意到海外延续至今的宗亲会现象,从而能够承担起《中国宗族通史》的清代卷与近现代卷的编写任务。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,我逐渐发现自己的研究受到社会人士的关注,反映出他们的现实需求,从而体验到了“置身事内”的境界。我的研究经历使我认识到,现当代史的研究,不管是否自觉,都意味着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是“置身事内”的关系,因此研究者应树立正确态度,在需要进行现实评价时要明确褒与贬的立场。

问答四

常建华教授提问:阎先生不仅倡导满学,也提倡紫禁城学的研究,请您谈谈紫禁城学的研究意义和希望。

阎崇年先生作答:我们都说“清承明制”,可见明清历史有很强的延续性。而研究明清史,故宫是绕不开的地方。巧的是,我们一家四代都在北京漂泊,用现在的话说就是“打工”,我小时候就听长辈多次说起故宫的辉煌壮丽。更巧的是,我在北京的家与故宫只有一街之隔,上学

的地方也只是一街之隔,这让我对明清史和故宫抱有浓厚的兴趣,很早就开始钻研清代档案。我比较重视实地考察,为了弄清楚雍正帝办公和休息场所的距离,还自行去故宫拿尺子丈量。所以我研究故宫学,算是得益于亲缘、地缘、学缘,可以扬长避短,把自己的一点学习成果反馈给大家。

问答五

杜家骥教授提问:二位先生已经就自己研究的专门领域进行了细致深入的介绍,下面我想请二位先生以清史为主,谈谈自己的研究心得。我们先请冯先生讲一下。

冯尔康先生作答:清朝有四个重要特点。第一,清朝在君主专制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,明代内阁多少还有宰相的影子,而清代的军机大臣只是皇帝的参谋,皇帝在战略决策中起决定性作用,以一人治天下,也以天下奉一人,缺乏对皇帝的制约性机制。第二,清朝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,虽然内部也有民族矛盾,但更重要的还是要看到多民族国家的发展。清朝根据各个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,实行了多元化的管理体制:在汉地实行行省制,西藏实行政教合一制,蒙古实行盟旗制,新疆实行伯克制,等等。这种管理体制的经验时至今日都值得吸取。第三,中国疆域的最终奠定是在清朝,特别是乾隆时代将版图扩张到一千四百万平方公里。第四,某些近代化的因素在清朝已经存在,例如商品经济的发达,呈现出了一种新气象。

问答六

杜家骥教授提问:目前对清朝帝王的研究很受关注,阎先生很早就精研努尔哈赤等清初帝王,请您介绍一下努尔哈赤、皇太极两代帝王的事迹。

阎崇年先生作答:谈到清朝的特点,冯先生说的是“果”,我说的是“因”。努尔哈赤和皇太

极两代帝王的努力,使清朝奠定统一中国的基础,使明朝已疏于管理的奴儿干地区重新被整合进大一统王朝之中,也整合了东北若干分散的部落,是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。在文化上,在本民族的女真文被遗忘后,重新创制了满文,是阿尔泰语系中罕见的文字系统,成功保存了大量本民族的珍贵史料。但是,在这一过程中,清朝也存在若干问题。第一,在“首崇满洲”的政策指导下,在京畿一带圈地占房,运用行政手段直接抢夺民众资产。第二,八旗特权。国家权力高度集中在一小批上三旗贵族的手中,为空前的君主专制埋下伏笔。清朝的御史基本是皇帝的奴才,再没有涌现出类似海瑞这样的人物。制度还造成八旗子弟有钱有粮,游手好闲,从而被“异化”,造成这一群体的整体腐败,从而影响到清朝的存续。第三,文字狱。清入关前就实行文字狱,杀戮儒生,入关后则注重用法律控制言论、钳制思想,这种做法是秦朝以来两千年帝制时代一以贯之的。以上三个问题积重难返,也为清朝的灭亡埋下祸根。

问答七

杜家骥教授提问:在清朝入关以后的皇帝中,最受关注的一位应该是雍正帝。冯先生在雍正帝研究的领域做了大量工作,所著《雍正传》在海内外影响很大,有请冯先生讲讲对雍正帝及其时代的见解。

冯尔康先生作答:我们以前谈到改革家的时候,总是谈到王安石、张居正,却谈不到雍正,可能是因为他是帝王。但我们还是要从具体的改革措施入手,对一个人做出评价。雍正的改革措施可以主要分为三个方面。第一,摊丁入亩。此后国家就不必耗费巨资统计户口,根据田地数量就可以有效征税。第二,养廉银制度。根据官员的级别发放养廉银,孟森先生便认为这是近代地方财政制度的雏形,这也是清朝“近代性”的一条体现。第三,除贱为良。如徽州的庄仆、广东的疍民等,雍正帝都允许他们脱离贱籍,三代之后就可以参加科举,有利于户籍制度的松弛和思

磨不平的“棱角”

清风慕竹

晏殊得知范仲淹的上疏不由大惊失色,批评他说,你行事如此鲁莽和轻率,不仅会耽误自己的仕途,还会连累举荐之人。晏殊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,范仲淹上疏的后果很快就显现出来了,天圣八年,刚到京城立足未稳的范仲淹便被贬出京,先任河中府通判,后又调任陈州通判。

离京前,范仲淹专门给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老师晏殊写了一封信,名《上资政晏侍郎书》,解释了自己做法的缘由,并且坚定地表示:“侍奉皇上当危言危行,绝不避言避行、阿谀奉承,有益于朝廷社稷之事,必定秉公直言,虽有杀身之祸也在所不惜。”晏殊看了只能摇头叹息——混迹官场却不知磨去棱角、善妥协知退让,注定是立不住、行不远的。

俗话说“吃一堑,长一智”,以范仲淹这样聪明而理性的人,不可能不懂得这个老百姓都懂的道理,但偏偏在同样的问题上,范仲淹第二次跌倒了。

明道二年(1033),刘太后驾崩,宋仁宗得以亲政,因为感念当年范仲淹曾为自己“伏义执言”,遂召他入京,拜为右司谏。谁知范仲淹不仅不感激皇帝的提拔之恩,反而在不久后跟皇帝较上了劲。这一年冬天,郭皇后与宋仁宗宠爱的尚美人吵架,怒不可遏的郭皇后一巴掌扇来,恰巧打在了赶来劝架的仁宗脖子上,仁宗大怒,当即召宰相吕夷简“验视”伤痕,准备废后。

消息传出,群臣议论纷纷,都认为废后不合适。范仲淹与御史中丞孔道辅等十余人跪伏垂拱殿外,请求召见,仁宗不见,派吕夷简出来解释。范仲淹等与之当庭辩论,将吕夷简驳得理屈词穷、无言以对。第二天,范仲淹打算早朝之后再次与宰相谏争,可他刚走到待漏院,皇帝的诏书就已下达,命他外放睦州(今杭州淳安)任知州,即刻赴任。右司谏的椅子还没坐热乎,范仲淹便再次被贬。接连碰壁,再硬的翅膀也应该知道收敛了吧,可范仲

淹却不断刷新人们的认知,再次给大家展示什么叫“以卵击石”。

景祐二年(1035),范仲淹因在地方工作出色,升任吏部员外郎、权知开封府,相当于当上了首都的市长。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角色,平稳地干上个三年两载,很容易出入相。然而第二年,他又将矛头对准了宰相吕夷简。他向仁宗皇帝进献了《百官图》,简单明了地标注出了哪些官员属于合理的循序升迁,哪些官员属于越序升迁、完全出于宰相的私意,尖锐地批评吕夷简把持朝政、培植党羽,任用亲信。吕夷简在朝廷深耕多年,岂能坐以待毙,他马上召集人马,给范仲淹罗列了三大罪名:“越职言事、勾结朋党、离间君臣。”斗争的结果不言而喻,范仲淹第三次被贬,这次去的地方是饶州,遥远而美丽的鄱阳湖畔。

这次出京,文武百官几乎无人敢为他送行。好友梅尧臣忍不住写了首《灵乌赋》给他,婉转地规劝说,你在朝中屡次直言,都被当作乌鸦不祥的叫声,还是学学报喜之鸟吧,不要像乌鸦那样报凶讯而“招唾骂于邑间”。对此,范仲淹很感激,但并不完全赞同,他回复了一首《灵乌赋》给梅尧臣,掷地有声地表示:宁鸣而死,不默而生。

在短短的八、九年间,范仲淹因直言劝谏先得罪太后,次得罪皇帝,后得罪宰相,只论对错,不论权势,确实有点不作不死的意思,故而三次被贬,但他似乎并未从中汲取任何教训。宋仁宗后来将范仲淹重新召回朝廷后,让他主动跟依旧雄居宰相之位的吕夷简道个歉,消除隔阂,毕竟一个和谐的氛围更利于工作。范仲淹淡然地回答说:“臣乡论盖国家事,于夷简无憾也。”我向来论事对公不对私,对吕宰相没有抱歉的地方。

范仲淹一生都保持了刚直不阿的棱角,纵是宦海沉浮、历经磨难,也未曾有丝毫改变。他在留给子弟的家训中说:“公罪不可无,私罪不可有。”意思是一个人做官,政治上必须坚持原则,不计得失利害,不怕得罪上级甚至皇帝;而个人操守,则务求清白,决不能贪赃枉法,授人把柄。

俯仰无愧,自然底气十足、棱角分明。难怪大思想家朱熹由衷地称赞说,范仲淹是天地间的一股浩然正气,是第一流的人物。这样的人,怎不令人心生仰慕?

历史随笔

“匆匆”原是“勿勿”之误

许晖

今天人们口中的“匆匆”一词,是形容急急忙忙的样子。但其实这是一个误用了一千多年的词,正确的用法是“勿勿”。

《说文解字》曰:“勿,州里所建旗。象其柄,有三游。杂帛,幅半异。所以趣民,故遽称勿勿。”“游”是旗帜的飘带;“杂帛”指杂色的装饰物;“幅半异”指半幅为红色,半幅为白色,古代的正色为白色,周代的正色为赤色,故为半赤半白之色;“趣民”指催促百姓,古代旗帜,纯色代表缓,杂色代表急,因此用“勿”这种杂色旗催促百姓赶紧聚集;“所以趣民,故遽称勿勿”,因为是催促百姓的缘故,所以引申而把急遽、匆忙称作“勿勿”。

《礼记·礼器》中说:“洞洞乎其敬也,属属乎其忠也,勿勿乎其欲其殄之也。”这是讲的祭祀宗庙的时候,容貌洞洞然,恭敬的样子,心中属属然,忠诚的样子。东汉学者郑玄注解:“勿勿,犹勉勉也。”即勤恳不懈的样子,盼望神来享用祭品。这个义项也是从急遽、匆忙引申而来的。

在著名的《颜氏家训》中,颜之推表达过这样的疑问:“世中书翰,多称勿勿,相承如此,不知所由,或有妄言此忽忽之残缺耳。”颜之推当然知道许慎的解释,因为紧接着就用许慎上述的话加以解说。可见今人书信结尾处常用的“匆匆”一词,古时却写作“勿勿”。比如王羲之的《章草帖》:“皇象章草,旨信送之,勿勿,当付良信。”皇象是三国时期吴国的著名书法家;旨信,书信。这几句话的意思是:皇象的章草作品,用书信寄给您了,此际匆忙,容后闲闲时再派遣好的信使前去。

到唐代时,“勿勿”和“匆匆”已经并用。杜牧《遣兴》:“浮生长勿勿,几小且鸣鸣。”这是用的“勿勿”,形容浮生之匆遽。“勿勿”则用得非常多,比如年融《送客之杭》:“西风吹冷透貂裘,行色勿勿不暂留。”

“勿勿”为什么会误写为“匆匆”呢?有两种说法:一种出自宋代学者黄伯思《东观杂论》:“而今世流俗又妄于勿勿字中斜益一点,读为忽字,弥失真矣。”另一种说法是表示急遽的“忽忽”或“忽忽”一词省写为“匆匆”。因此明代学者杨慎在《丹铅续录》中感叹道:“好古者但知‘勿勿’而笑‘忽忽’,逐俗者又但知‘忽忽’而笑‘勿勿’,皆谓非也,是以学者贵博古而通今也。”

语词精奥



大中祥符八年(1015),范仲淹荣登进士榜,正式开启了他的仕途之路。他很早就立下了“不为良相,便为良医”的人生理想,因而一登场便展现出了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的情怀。

范仲淹起初虽在地方任职,却十分关心国家大事,“每慷慨论天下事,奋不顾身”。与其他人不同的是,别人都是私下议论,发发牢骚,痛快痛快嘴,而他却是公开议政,直达天庭。天圣六年(1028),范仲淹向朝廷上疏长达万言的《上执政书》,奏请改革吏治、裁汰冗员、安抚将帅。他的万言书得到了时任宰相王曾和枢密使晏殊的赞赏,在他们的举荐下,范仲淹被召入京,任职秘阁校理,虽然这只是负责皇家图书典籍校勘和整理的职位,但却进入朝廷权力中枢的重要一步,只要能稳扎稳打,不愁一个光明的政治前途。哪料想,范仲淹一出手就得罪了大权在握的皇太后。

天圣七年,十九岁的宋仁宗准备率领百官在会庆殿为刘太后祝寿。范仲淹认为此举甚为不妥,因为它混淆了家礼与国礼,于是他全然忘记了图书管理员的身份,上疏仁宗说:“皇帝有事奉亲长之道,但没有为臣之礼;如果要尽孝心,于内官行家人礼仪即可,若与百官朝拜太后,有损皇上威严。”奏疏报了上去,却没有任何回音。范仲淹干脆又上书刘太后,请求她还政仁宗。原来宋仁宗13岁登基,太后刘娥以皇帝年龄尚小为名义垂帘听政,现在虽然仁宗已经成人,但刘太后并没有还政的意思。不得不说,范仲淹此举有点哪壶不开提哪壶。